

丛书总顾问：潘懋元
丛书总主编：刘海峰

“弦歌不辍”系列图书

抗战烽火中的 武汉大学

涂上飙 刘 昕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KANGZHANFENGHUO ZHONG DE WUHANDAXUE

抗战烽火中的武汉大学

涂上飙 刘 昕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烽火中的武汉大学/涂上瓢,刘昕著.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7

(弦歌不辍: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

ISBN 978-7-5649-2052-4

I. ①抗… II. ①涂…②刘… III. ①武汉大学—校史—1937~1945

IV. ①G649.28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3960 号

责任编辑 薛建立

责任校对 柴桂玲

封面设计 郭 灿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22864495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06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总 序

刘海峰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随着平、津、沪、宁相继陷落,华北、华东沦入敌掌,多数高校遭到日寇破坏,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抗战烽火中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日本侵略者深知大学对一个国家的重要作用,认识到“中国所有大学都是抗日基地”,所以,对占领地的中国大学肆意加以破坏,如摧毁南开大学、炸平厦门大学靠海的建筑等;对转移到后方的大学也不时进行轰炸。当时,多数高校被迫西迁,西北达陕甘,西南及云贵,中部溯江而上至四川各地,途中交通不便,加上敌机狂轰滥炸,许多高校一迁再迁,颠沛流离,历经磨难。

在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备受摧残的情况下,教育工作者不辞千辛万苦,坚持办学,使抗战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不仅没有中断,而且还有发展。抱着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国民政府实行“平时作战时看,战时作平时看”的方针,大力保存和发展高等教育。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所载历年度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概况统计表,1936年之前,中国有高等学校108所,其中,大学及独立学院78所、专科学校30所,在校生41922人、毕业生9154人。到1937年,减少至91所,其中,大学及独立学院67所、专科学校24所,在校生31188人、毕业生5137人。而到1945年,竟然有高等学校141所,其中,大学及独立学院89所、专科学校52所,在校生83498人、毕业生14463人。也就是说,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没有衰败,反而得到了大发展,1945年比1937年的高等学校增加了50所,在校生数增加了1.68倍,毕业生数增加了1.82倍,比1936年也有很大的增加。在异常艰难的战争环境中,中国高等教育取得这样的发展,不能不说是教育史

上的奇迹。

而且,在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和《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等抗战时期教育政策的指导下,此一时期的大学国立化进程不仅没有受阻,反而在逆境中得到长足发展,抗战时期及抗战复员阶段设立的国立大学特别多。抗战时期新设或改为国立的大学有10所,抗战胜利当年和次年新设或改为国立的大学有6所。此时期的高校励精图治、人才辈出,对于国民教育的维持、传统文化的延续、现代知识的传授、人民素质的提高以及抗战所需的技术人才和建设人才的培养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抗战时期绝大多数高校师生都有一种爱国自强奋发向上的精神,许多高校在艰苦的条件下卓绝奋斗、弦歌不辍,在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抗战时期的多数高校担负起了对文化传承负有的责任,树立起了大学精神的伟大丰碑。

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学都经历过特殊的磨难,都有一段传奇的历史,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中,传承着民族文化的血脉与灵魂,表现出民族精神的不屈与奋进,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悲壮乐章。其故事值得传播,其精神值得弘扬。现今我们到一些相当僻远的战时西迁办学高校的遗址参观,往往会感叹,这些地方即使是现在也仍然交通不便,可以想见当年许多民族精英经过长途跋涉,多年僻居其中,生活会有多么艰辛。然而,当时大学师生物质生活虽然艰苦匮乏,精神生活却丰富多彩,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仍然创造出了辉煌的业绩。

今天,抗战的硝烟早已远去,但中国高校在抗战岁月中显现的大学精神和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宝贵精神财富,仍然在激励着当代中国教育工作者。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河南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了这套“弦歌不辍——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系列图书,我认为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者,愿共襄盛举,故草数语,以为书系之引。

2015年7月29日

前 言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武汉大学与全国众多高校一样迁往内地办学,千余名师生以空前的爱国热情前往四川乐山。乐山八年,广大师生以“明诚弘毅”的精神坚守了学术、传承了文化。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追寻历史对于弘扬大学学术、创新大学文化、传承大学精神都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38年,当武汉岌岌可危之时,学校于2月21日召开第322次校务会议,商议迁校事宜,决定迁至四川乐山。3月,部分教职员工与尚未完成学业的学生共600余人乘船溯江西上,栉风沐雨,辗转反复,终抵嘉州。4月,在乐山正式复课,迁川分部暂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7月,人员全部抵达乐山,学校正式易名为“国立武汉大学”。从此,武汉大学师生与大佛相邻,以三江为伴,弦歌不绝,以至八载。

乐山八年,虽然漂泊流离,居文庙、住神祠,白天日寇空袭,夜晚小偷光顾,吃的是“八宝饭”,时常病贫交加,但广大师生励精图治,以坚忍不拔的精神书写了武汉大学校史上光辉的一页。因学术地位的提高和社会声誉的大涨,武汉大学与当时的中央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浙江大学一道被世人并誉为“四大名校”。

乐山八年,是大学精神传承的八年。此时学校以“明诚弘毅”为校训。“明诚”出于《礼记·中庸》,其文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弘毅”出于《论语·泰伯》,其文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

乎？”八年，学校的先生们以“明诚弘毅”的精神坚守着学术独立，探索科学、弘扬人文、强化爱国等精神，使优秀文化、民族精神传承不息。正是因为有一批教育家们对大学精神的坚守，才有“民国武大”的辉煌。

乐山八年，是教育救国的八年。八年里，刘永济、刘赧、徐天闵、苏雪林、陈源、方重、朱光潜、高翰、万卓恒、方壮猷、吴其昌、李剑农、刘秉麟、周鲠生、李浩培、刘迺诚、陶因、杨端六、王星拱、桂质廷、曾城益、江仁寿、黄叔寅、邬保良、叶峤、陶延桥、张珽、邵逸周、谭声乙、余炽昌、陆凤书、郭霖、白郁筠、陶延桥、赵师梅、陈季丹、周开基等在此任教；他们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始终屹立讲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乐山八年，是学术奉献的八年。八年里，由于一批学人的学术坚守，学校取得了瞩目的成绩。此时，学校以“国立武汉大学”为机构署名在《Nature》和《Science》发表科研论文4篇，加上抗战前后发表的4篇，共有8篇。为提高学术水平，教育部进行了两批部聘教授的评选，两批共有35人当选。武汉大学的周鲠生、杨端六、刘秉麟当选，位列全国第4名。关于学校的学术地位，李约瑟在《川西的科学》一文中的评价是：“武汉大学学术水平非常之高，甚至可与国立西南联大相媲美，这是毫无疑问的。”

乐山八年，是服务社会的八年。为推行社会教育，王星拱校长亲自担任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主席，进行抗日宣传、民众教育、学术介绍、经济调查、法律咨询以及艺术公演等活动。在学术讲演中，燕树棠、高翰、郭霖、高亨、吴南熏、朱光潜、叶峤、王星拱、邵逸周、刘秉麟、桂质廷、涂允成等名家纷纷登上社会讲台。学校举办理科、工科、美术、图书及体育表演等学术展览会，普及科学知识。开办短训学校，办起了商业簿记补习班，为平民增加商业知识。还为国家航空委员会所需材料进行拉力、压力、冲力等方面的实验研究，为嘉裕电气公司提供技术指导，为四川省农业改进食粮进行豆科植物试验。还用马前子碱救治了乐山一度恐慌的“疤病”。

乐山八年,是自强不息的八年。抗战期间,因物资供应的不足,师生们缺衣少食是常有的事。由于长期食用掺杂砂石稗谷的“八宝饭”,营养不良、体弱多病者比比皆是。乐山八年,吴其昌、黄方刚、郭霖、萧君绛、费监照、王若怡、孙芳等学者及学生计百余人客死于斯。他们所葬的荒丘被称之为“第八宿舍”。即便如此,学生们面对艰窘困厄发愤苦读,在当时的“全国学业竞赛”中屡创佳绩,从这里走出陈荣悌、俞大光、欧阳予等十多名院士。教师们则勤勉治学、笃实育人:方重的《英国诗文研究集》、袁昌英的《法国文学(小史)》、吴其昌的《金文世族谱四卷(二大册)》、方壮猷的《东胡民族考》、杨端六的《货币与银行》、刘迺诚的《比较政治制度》、张珽的《植物生态学》等著作都是勤勉治学的结晶,朱光潜教授讲课时的提纲挈领、戴铭巽教授的先易后难、戴镠龄教授的严格要求等都是笃实育人的体现。

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师生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明诚弘毅”的深刻内涵。今天,追忆这段历史,仍就不应忘记当年师生们所秉持、弘扬的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已逾百廿的武汉大学应当从厚重的历史中汲取更多智慧和教益。

目 录

第一章 历尽艰难的西迁之路	(1)
第一节 全国大学的内迁	(1)
第二节 武汉大学的东西迁	(5)
第二章 百废待兴的校园建设	(14)
第一节 修建教室和宿舍	(14)
第二节 合理规划 功能分区	(17)
第三节 兴建实验室和工厂	(19)
第四节 添置仪器设备	(21)
第五节 添置图书资料	(24)
第三章 艰难困苦的师生生活	(31)
第一节 办学经费捉襟见肘	(31)
第二节 开拓财源 缓解危机	(38)
第三节 节衣缩食 勉强度日	(40)
第四节 贫病交加枉夺生命	(42)
第五节 日机轰炸雪上加霜	(45)
第六节 钱歌川的乐山亲历	(52)
第四章 注重实效的大学管理	(55)
第一节 教育部的管理规定	(55)
第二节 武汉大学的机构设置	(58)
第三节 学校职员管理情况	(64)

第四节	管理机构的特点分析	(68)
第五章	大师云集的队伍建设	(72)
第一节	严格的教师聘任程序	(72)
第二节	历年聘任教师的情况	(74)
第三节	聘任教师的薪酬待遇	(77)
第四节	教授是教学的主体	(81)
第五节	积极开展科学研究	(86)
第六节	李约瑟与国立武汉大学	(98)
第六章	严谨细致的教学管理	(105)
第一节	学生的招生选拔	(105)
第二节	学生的培养教育	(108)
第三节	毕业和就业	(128)
第七章	特色鲜明的社会服务	(133)
第一节	国民政府的社会服务政策及服务内容	(133)
第二节	武汉大学造福乡邦的具体实践	(140)
第八章	走在前列的硕士培养	(150)
第一节	全国的研究生教育概况	(150)
第二节	学校研究生教育发展条件	(154)
第三节	研究生的招生、培养与学位	(157)
第四节	研究生教育的特点	(164)
第九章	进步师生的革命斗争	(173)
第一节	中共武汉大学党组织的重建及活动	(173)
第二节	进步社团的活动	(179)
第三节	教师中的革命活动	(186)

第四节 踊跃捐献 投笔从戎	(191)
第十章 初具规模的学科建设	(199)
第一节 国民政府的高等教育改革	(199)
第二节 武汉大学的学科发展	(208)
第十一章 闻名内外的学者大师	(217)
第一节 教师概况	(217)
第二节 拥有代表教授最高水平的部聘教授	(219)
第三节 在全国学术审议委员会占有一席之地	(229)
第四节 享受休假进修和考察的教师人数较多	(232)
第五节 部分名师概览	(234)
第十二章 追求卓越的拔尖人才	(249)
第一节 卓越拔尖人才的体现	(249)
第二节 部分优秀毕业生概览(按毕业时间排序)	(265)
第十三章 明诚弘毅的乐山精神	(277)
第一节 明诚弘毅诠释乐山精神	(277)
第二节 育人为本 人格至上	(278)
第三节 学术自由 兼容并包	(287)
第四节 追求真理 教育救国	(298)
第五节 研究实学 服务社会	(305)
第十四章 历经艰辛的珞珈东归	(316)
第一节 历时一年的东归之路	(316)
第二节 乐山薪火的传承	(324)
参考文献	(333)

第一章 历尽艰难的西迁之路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蓄意挑起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勇反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由于中日国力相差悬殊,加上国民政府的消极、片面抵抗政策,我国大片国土沦丧,众多城市沦陷。与之相伴的是大学教学活动无法正常开展,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迁校办学迫在眉睫。

第一节 全国大学的内迁

1937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会议,专题讨论高校的迁移问题。依据行政院会议的精神,9月,教育部决定沿海高校向内地迁移。

一、全国高校内迁概况

说到迁校,最早的是东北大学。“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大学被迫开始流亡、内迁,从沈阳到北平、开封、西安,最后到四川的三台。但是,此时的内迁是局部的、非政府主导的。

1937年9月以后,大规模的高校迁移拉开序幕。

这时着手迁校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它们在北大蒋梦麟、清华梅贻琦和南开张伯苓三位校长的带领下,经民国政府同意开始内迁。起初在长沙选定校址,建立长沙联合大学,并在1937年

11月开始上课。但是,随着南京的沦陷,不得不继续内迁。它们分两路迁往云南:一路由广州经香港,经越南,进入云南;一路从湖南步行,经贵州,到云南。1938年4月到达昆明,5月开始上课。学校也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在三所大学联合向西南迁移的同时,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和国立北洋工学院迁往西安,组建了西安临时大学,并于1937年11月开学。1938年学校又迁往陕西的城固、南郑等地,学校也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与此同时,华东、华南和华中的一些高校也开始内迁。国立中央大学1937年10月开始西迁,1938年11月到达重庆。国立浙江大学1937年11月开始西迁,先后迁往浙江的天目山、建德,江西的吉安、泰和,广西的宜山,贵州的遵义湄潭,历史上称为“文军长征”。国立同济大学1937年10月开始外迁,先后迁往浙江金华、江西赣州、云南昆明、四川李庄和宜宾。国立交通大学上海分校迁往重庆、唐山,北平分校迁往贵州。国立中山大学先后迁往云南澄江,广东坪石、连县、仁化。国立厦门大学迁往福建长汀。国立湖南大学迁往湘西辰溪。省立山西大学先后迁往晋南,陕西三原、秋林。省立河南大学迁往河南境内的信阳、南阳、洛阳以及陕西的西安、宝鸡。国立山东大学先后迁往安徽安庆、四川万县,后停办。省立安徽大学迁往湖北沙市,后停办。

除了一些国立大学内迁以外,还有不少省立、私立等学校也先后迁移了。如:

迁往重庆的有私立湘雅医学院、私立复旦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私立朝阳学院、私立沪江大学、江苏省医政学院、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等。

迁往贵州的有私立大夏大学等。

迁往四川的有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私立金陵大学、私立齐鲁大学、私立金陵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私立燕京大学、牙医专科学校、东吴大学法学院、中央工业职业学校、戏剧学校、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山东医学专科学校、中央政治学校、蒙藏学校、北平师范大学劳作专修科、江苏

省立蚕丝专科学校、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江苏医政学院、南通学院医科、私立铭贤学院、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吴淞商船学校、国立音乐院、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等。

迁往云南的有私立华中大学、私立中法大学、中正医学院等。

据统计,迁移前全国有各类高校 108 所,其中,大学 42 所,独立学院 34 所,专科学校 32 所。除 17 所由于战乱无法办理、14 所在敌占区外,其余的 77 所都迁移内地。^①

二、高校内迁的意义

抗战时期高校的内迁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一次战略大转移。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高校的迁移无疑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第一,保存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仅表现在掠夺财物、杀辱民众,还要泯灭中华民族的意志、摧残中华民族的文化,以最终达到征服整个民族的目的。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邪恶用心,无数的爱国知识分子以学校为阵地,为传承中华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面对敌人的狂轰滥炸,爱国的专家学者们始终坚持人在学校在。为此,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钱钟书、华罗庚、曾昭抡等著名学人从长沙步行到昆明创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私立东吴大学、私立之江大学四迁其校,浙江大学、私立铭贤学院五迁其校,省立河南大学、江西省立医专六迁其校,国立中山大学、省立山西大学七迁其校。

正是这一批大学的存在,使得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在最为艰难的时期得以传承延续。

第二,为抗战提供了技术和人才支撑。对于抗战所需要的技术,高校通过不断调整课程和专业来保证。由于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土木工程、化学工程、医药救护等方面的技术和人才缺乏,高校一方面加大

^① 董宝良主编:《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53 页。

招生力度,另一方面充实课程并增设专修科来予以落实。同时通过加强科学研究来保证战争所需要的技术。例如,清华大学就设立了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和国情调查 5 个特种研究所^①。

对于战争所需要的人才,高校除了 4 年本科培养具有一定专业技术的人才外,还不断地增设专修科,用 1~2 年的时间,培养战争所需要的应用型人才。武汉大学当时就增设了矿冶系和机械专修科^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

第三,促进了西南、西北边疆的现代化。高校由沿海向西部内陆的迁移是中国高等教育中心的一次大转移。它除了具有在全民族抗战中保存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重大意义,还打破了西南地区长期封闭、发展停滞的状态,促使当地经济、文化出现了一段“跳跃式”的发展,从而加快了西南地区近代化的过程。随着高校的内迁,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桂林以及西安等城市及周边的高等教育得到大发展。在迁移中,大批的文化精英涌入内地,提高了内地的师资水平和办学质量。内迁高校通过文化启蒙、科学普及,大大提高了少数民族及边疆地区民族文化的素质,既传播了新思想、新技术、新知识,推动了教育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开启了民智民风,又培养了大批后方开发与建设的亟须人才,推动了西南地区学术文化的发展^③。通过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及资源的调查和研究,为西部的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抗战胜利后,一批教育资源留在了西部,为西部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奠定了后续发展的基础。

①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 377 页。

② 涂上飙主编:《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1938~1946),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13 页。

③ 侯德础、张勤:《高校内迁与战时西南科技文化事业》,载《抗日战争研究》,1998 年第 2 期,第 112 页。

第二节 武汉大学的西迁

作为中国中部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当时领导全国抗战的中心,在南京沦陷后,武汉也因此成为日军下一个进攻的重点。在战争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武汉大学一方面被迫中止了珞珈山新校舍的部分后续工程建设,另一方面校务委员会作出了冷静的决策,在战争未爆发之前西迁乐山。

一、精心考察的西迁校址

学校搬迁何处关系到学校战时的重建和发展。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有很多高校选择了西迁四川、云南、广西等地。这些地区都是当时中国的大后方,有利于学校的稳定和发展。但是,随着战争的推进,广西在豫湘桂战役中部分沦陷,云南在日军占领缅甸后也是饱受战争的压力,相对而言四川较为安全。

学校曾为此做过精心的考察。1938年1月,学校派人前往四川各地考察,最后认为四川省的乐山市最为适宜。其理由是:①该地尚没有设立专科以上学校;②该地处成都之南,水陆交通便利;③该地生物、矿物以及产蓄丰富,可进行研究,以利于将来开发;④该地民情风俗较为淳朴,且文化程度也不低于其他大城市;⑤该地公、私建筑物较多,将破旧的地方加以修缮就可使用;⑥该地处内地后方,不易受敌机威胁,学生可以安心读书。

据经济系校友刘涤源(1912~1997年)撰文描述,当时由杨端六教授和邵逸周教授率领一批精干人员队伍溯江西上到达重庆,然后兵分两路:一走水路,继续沿长江西行,再由泸州、叙府向北行,到达乐山,沿途对每一较大城镇都实地考察。另一走陆路,由重庆乘汽车到成都,又向南行,乘汽车到乐山也是沿途实地考察,两路胜利会师。他们经过对沿途城镇认真对比分析,最后选定乐山为迁校校址。

学校当时准备西迁的单位、人员和物件众多,有文、法、理、工、农学院,共计 15 个系,图书仪器尤为繁多。因此,为了让学校搬迁后能够尽快开学,同时也为了节省经费,学校决定因陋就简,将许多破旧房屋修缮为校舍。修缮工作由工学院院长邵逸周和法学院院长杨端六负责。其具体规划如下:

(1) 文庙、崇圣祠、三清观与九峰书院。当时文庙除孔子座位以外,其余均空废,全部房屋无人占用。崇圣祠接连文庙,情形一样。三清观在文庙山顶,更是破旧不堪。九峰书院驻有保安队。这些地方修缮后,可作为教室及图书、仪器存储场所。

(2) 华新丝厂与凤翔丝厂。华新丝厂因借贷关系,已将厂房抵押给四川省政府,当时驻有第 44 军第 163 师第一旅第一团士兵一营。凤翔丝厂临近华新,为私人产业,驻有补充兵一队。这两处房屋若加以修理,可作为学生宿舍及一部分教室使用。

(3) 大佛寺和乌尤寺。两寺在嘉定对岸,仅一水之隔。大佛寺位于凌云山上,规模较大,内有藏书楼,光线充足,非常适合教学。客室等处可居住教员和学生。乌尤寺在另一山顶,客室仍然可用。两寺僧人不过二三十人。学校可借用这两处地方,并酌情给予津贴补助。

二、细致周到的西迁安排

1938 年 2 月 3 日,校长王星拱致函四川省政府,指出为了巩固后方、保存实力,以便长期抗战,请求四川省政府指拨嘉定(即今乐山)的文庙、崇圣祠、三清观、九峰书院、华新丝厂、凤翔丝厂、大佛寺和乌尤寺等处为武汉大学嘉定校区之校址。

1938 年 2 月 21 日,学校召开了第 322 次校务会议,议决迁校问题(如下页图 1-1 所示),欲将一、二、三年级学生暂迁四川乐山,暑假后酌情再迁贵阳,四年级学生仍留珞珈山结束学业,并商请教育部允许和支持。迁校方案获准后,同月,经第 323 次校务会决定,成立迁校委员会,推定杨端六、邵逸周、方壮猷、刘迺诚、曾城益、郭霖、叶雅各为委员,杨端六为委员长;并决定在宜昌、重庆两地设立迁校办事处,同时